

书评选

SHUPING XUAN

(文艺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出版班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書 評 選

(文 藝 部 分)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出版班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1959年・北京

書評選 (文艺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出版編輯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藍旗西大街胡同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71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204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9
字数:237,000 册数:1—12030(2,000+30+10,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4):0.77元

前 言

現在我国每年出版的書籍很多，一般讀者在这許多書籍面前难以選擇。書評可以帮助他們了解書籍；通过圖書評論，人們也可以了解我国科学和文艺創作的成果，以及思想战綫上的斗争；而且書評本身，就是一种进行思想战斗和繁荣創作的有力武器。由于这些原因，我們編輯了这本书評选。

本書所收的文章是1957年春天到1958年8月这一段时期的。除少数是書籍的“序言”外，其他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全書分兩輯出版，一輯是文学方面的，一輯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对象是一般讀者。編者考虑到讀者对象和本書的篇幅，学术性的專門著作的書評，我們沒有选入。除个别情况外，一般不选評論外国書籍的書評。

所选書評，有党的負責同志写的，有作家写的，也有一些是工人、士兵写的。关于后者，有的可能写得并不成熟，但我們認為是繁荣書評的一个方向，需要倡导。書中的文章，有各种形式，我們也选入一些書籍的“序言”。我們認為，好的“序言”，也是評論書籍的一种方式。

从編輯本書的过程中，我們深深感到有許多值得評介的書籍沒有得到評介；文学創作的評論較多，社会科学的書評不多，而科学技术的書評則更缺乏。我們認為，当我国正在进行着偉大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时期，文艺書籍的評論要进一步加强，而社会科学的著作和科学技术書籍的評論，特別需要大力开展，这对繁荣我国学术和推动技术革命是有重要作用的。

由于編者的見聞和水平的限制，本書所选書評不尽恰当，有些重要的書評我們可能沒有选入，也有一些选入的書評可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錯誤的。这些都需要讀者指正。

最后要說明的，本書在編选过程中，曾得到科学界和文艺界許多同志的帮助，他們为本書的編輯工作提供了許多宝貴的意見，这里特向他們致謝。

編者 1958年9月

目 录

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 林默涵、張光年、邵荃麟 1

——座談周揚同志的文章“文艺战綫上的一場大辯論”

我們要做革新派 馬鉄丁 20

——讀“文艺战綫上的一場大辯論”后記

“再批判”的“編者按語” 26

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 荃 麟 27

——論“荷花集”及其作者的思想

斥反党者的謬言 刘綬松 44

——評馮雪峰：“回忆魯迅”

我看到了我們的文艺水平的提高 何其芳 50

一部引人入胜的長篇小說 侯金鏡 58

——讀“林海雪原”

評“紅日” 罗 赓 73

党使我們的青春发出光輝 刘导生 88

——讀“青春之歌”

談小說“青春之歌” 巴 人 95

壯闊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圖画 方 明 102

——讀小說“紅旗譜”

老战士話当年 曹承宗等 112

——“文艺报”举行“紅旗譜”座談会紀录摘要

秦德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	“文艺报”記者 張 綱	124
——鋼鉄工人座談“百煉成鋼”		
一个优秀的工人英雄形象	迟夢洲	129
——評“百煉成鋼”中的人物秦德貴		
英雄的花,革命的花	李希凡	134
——讀馮德英的“苦菜花”		
讀“山乡巨变”	王西彦	143
从生活到文学創作	李玉年	151
評介“小城春秋”	王世德	153
社会主义的英雄史詩	陈鳴樹	163
——評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		
一篇生动的报告	于 頌	169
——“典型报告”讀后		
关于莎菲女士	張天翼	171
“本报內部消息”是一篇反动的特写	甘惜分	182
用资产階級观点写的“末代皇帝傳奇”	端木蕻良	189
和青年讀者談談“三言”“二拍”	辛 夷	193

三

工人詩歌百首讀后感	茅 盾	197
探工人歌謠的宝庫	徐景賢	201
——介紹上海工人民歌集		
“大躍進之歌”序	郭沫若	205
唱得長江水倒流	潘旭瀾	207
——讀“农村大躍進歌謠選”		
讀民歌選集后的一点感想	石西民	214
贈“海鹽大躍進詩歌選”	中共嘉興地委副書記 陶振民	216
战士詩——革命英雄主义的战鼓	魏 巍	216
——为紀念八一建军節而作		
从“王貴与李香香”談学习民歌	賈 芝	223

“十月的歌”引言	田 間.....	234
----------------	----------	-----

四

“志願軍一日”再版序	彭德怀.....	241
“星火燎原”贊	刘白羽.....	242
不屈的人	馬鉄丁.....	254
——讀方志敏同志“獄中紀實”后記		
“祖國的兒子黃繼光”	战士 子 蘭.....	257

五

一篇心理的、幽默的、教育的童話作品	陈伯吹.....	262
——讀“宝葫蘆的秘密”		
讀“小黑馬的故事”	刘厚明.....	271
勇敢者的道路	陈斐琴.....	276
——介紹“五彩路”		

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

——座談周揚同志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場大辯論”

林默涵 周揚同志這篇文章，內容很豐富。他運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根本原則，不但總結了去年文艺界那場震動心弦的反右派鬥爭的經過和結果，並且分析了這場鬥爭的歷史的和階級的根源，對長期以來我國左翼文艺運動中的分歧和爭論，也提供了一個澄清和總結的基礎。

周揚同志的文章，說明了文艺战线上去年這場鬥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文艺上的兩條路綫的鬥爭是由來已久的。資產階級不但從正面攻擊無產階級的文艺，而且打進無產階級的文艺隊伍中來破壞無產階級的文艺。長期以來，文艺界所進行的許多鬥爭，實質上都是這兩條路綫的鬥爭的反映。這個長期的分歧，到了去年那樣的历史條件下，就不可避免地要來一個總的清算了。有些同志不了解這一點，他們以為去年那場鬥爭的引起，只是因為有些人偶然說了一些反黨反人民的話，甚至於有人把丁陳反黨集團也看成偶然的事情，這是一種不懂世事的人們的糊塗想法。

我們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打交道，已經很長久了。在“五四”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曾經結成統一戰綫，共同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文化和舊文學。但是，沒有多久，這個統一戰綫就分裂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快就和敵人妥協，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們就完全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站到反動方面去了。從此，他們的鬥爭鋒

芒就完全指向無产階級和無产階級的文学。以魯迅为首的革命文艺同資产階級的文艺派別进行了一連串的斗争，徹底打垮了“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派等等的进攻，真是所向披靡，資产階級的正面攻势，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了。

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文艺队伍里，也混进了一些資产階級分子。他們采用另一种方式来破坏革命的文艺。这就是打着馬克思主义的招牌，来进行反馬克思主义的活动。馮雪峰、胡风等人就是这种混进革命文艺队伍中来的資产階級分子。他們在革命文艺队伍內部經常兴风作浪，頑强地抗拒着党所領導的馬克思主义文艺路綫，使我們不得不在同对面的資产階級文学派別作斗争的同时，还要同內部的資产階級分子和資产階級文艺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

正如周揚同志所說，馮雪峰和胡风所代表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資产階級路綫。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用資产階級思想来修改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則，抽掉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質。表現在文艺方面，我們同修正主义者的最根本的分歧，是在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問題的看法上。我們始終認為，文学艺术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文艺事业是無产階級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須服从于政治的任务，而修正主义者則总想从無产階級手里夺去这个武器，用“艺术即政治”等口号来反对艺术服从革命的政治；实际上是要使艺术服从反革命的政治。文艺上的其他許多分歧都是从这个根本分歧来的。既然文学艺术不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那末，当然也就無須乎党的領導，作家也不必和人民結合和改造自己的思想立場了。長时期来，我們同馮雪峰、胡风和王实味等人所爭論的，尽管有时表現在这个具体問題上，有时表現在那个具体問題上，但归根結蒂都离不开这个最根本的分歧問題。

馮雪峰的修正主义思想，明显地表現在他对“第三种人”的看法上。大家知道，“第三种人”是公开反对艺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他們咒罵党和馬克思主义“干涉”了文艺，污蔑革命的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他們对革命文艺的誹謗和污蔑，遭到了魯迅先生和瞿秋白等

同志的迎头痛击。奇怪的是自称“馬克思主义者”的馮雪峰，这时却同“第三种人”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他在当时以“何丹仁”笔名发表的論文“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傾向与理論”中，竟認為第三种人是“反对着地主資產階級及其文学”的，把他們“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和“友人”。大家知道，馮雪峰一心要結交的“帮手”和“友人”之一苏汶即杜衡，后来当了国民党書报檢查所的檢查官，他的另一个“帮手”和“友人”第三种人胡秋原現在还在台灣給蔣介石效劳。馮雪峰一方面保护“第三种人”，另一方面却把槍口朝內，他的論文的主要目的，原来不是为了反击“第三种人”，而是“要糾正易嘉（即瞿秋白）和起应（即周揚）对于苏汶先生的估計上的那严重的錯誤”的。这就怪不得苏汶看到馮雪峰那篇文章会那么贊揚备至，認為是“最宝贵的收获”了。就在那篇論文中，馮雪峰还大大宣傳了一通“艺术即政治”的論調，他以資產階級貴族老爷的态度十分輕蔑地把那些具有革命內容而艺术上还难免比較幼稚的作品斥为“淺薄的、江湖十八訣”。所以，連苏汶也十分滿意地說，馮雪峰那篇論文“有許多地方只是借用了批判我的題目来发表他自己的正面的見解，同时这些見解又有許多是我所早已如此想的。”

1936年，在上海文艺界发生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問題的論爭。这场論爭引起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分裂。現在我們都已知道，这是由于馮雪峰和胡风等人的挑撥离間所造成的。关于这两个口号本身的短長，还可以研究。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應該看看这次論爭的實質。馮雪峰当时用“呂克玉”的笔名写了一篇反对“国防文学”的文章：“对于文学运动几个問題的意見”。在这篇文章中，馮雪峰除了指責主張“国防文学”的同志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之外（实际上搞宗派活动的，正是馮雪峰自己），就是否定作家有学习馬克思主义的必要，認為作家“在他的生活上”，“在他对于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研究上”，“在他对于題材的攝取上”，“在他写作的过程上”就可以“获得‘正确的世界觀’”。如果向作家提倡学习馬克思主义，提倡掌握正确的世界觀，那就是“文学理論

上的机械論”。这个“理論”后来被胡风、雪葦等人所繼承和發揮。他們詆咒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20年的机械論統治”(胡风)，而吹嘘他們——从馮雪峰、胡风到雪葦——是代表现实主义的理論傳統(雪葦)。实际上，正如周揚同志文章中所說，他們所代表的是反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綫。

如果說1932年馮雪峰等人还是在暗暗地保护“第三种人”，到了1936年，他們自己就公开地提出不要馬克思主义思想，認為馬克思主义思想是束縛創作的了。他們也和“第三种人”一样要求“創作自由”，可是他們却不是向国民党去要这种自由，而是向共产党、向共产党所領導的主張馬克思主义的文艺家去要这种自由。这时，馮雪峰就公开唱起“第三种人”唱过的調子，說什麼“各个作家自由写作，不受任何主义的束縛”了。很明显，这句话的意思是說馬克思主义也是束縛作家的写作自由的。雪葦則認為对“法西斯主义”文学、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等等都应该一視同仁，誰要是批評这些“文学”，那就是“公式主义的空洞命令”，“虛伪理論的巧妙抹煞”。他們的确比当年“第三种人”都“还要徹底”得多。

那时許多同志对于馮雪峰、胡风等人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他們的宗派活动是进行了斗争的。但是，因为一方面是处在敌人統治的环境下，斗争的方向不能不主要对着正面的敌人，对于内部的資产階級分子和資产階級思想不可能进行徹底的斗争；另一方面，那些基本上正确的同志本身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关門主义等等的缺点，而教条主义是沒有力量战胜修正主义的。由于我們的同志当时的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理論力量不够，而又失去了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所以，那些斗争不但沒有解決問題，而且在那时也还不可能充分認識到这个分歧的重要性，还不可能認識到这种分歧就是兩条路綫——馬克思主义路綫和修正主义路綫的分歧。

抗战爆发，形势大变。一部分作家跑到了延安，一部分留在国民党統治区。到延安去的有各种各样的作家，而丁玲、蕭軍、王实味、雪葦等，都是和馮雪峰或胡风有过或有着密切联系的。他們虽然分处南

北，而思想上却是一脉相連。馮雪峰、胡风实际是这些人的精神上的“盟主”。胡风的文章，丁玲就常把它轉載在“解放日报”她所編的副刊上。当时在延安的各种各样的作家中，政治水平是很不一致的，許多人都犯过这种那种的錯誤，他們是在不断克服錯誤的过程中提高了觉悟，靠攏了党。只有和馮雪峰、胡风相联系的丁玲、蕭軍、王实味等人不是这样，他們拒絕按照工人階級的思想立場来改造自己，却頑強地要按照他們資產階級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革命根据地。这样，他們就在延安掀起了那場有名的反党风潮。这难道是偶然的事情嗎？

不，这决不是偶然的。資產階級分子到了工农当权的地区，两种思想、兩条路綫的冲突就不能不更尖銳了。兩方面都不能再容忍：党和群众要求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要求文艺加强人民的团结，鼓舞人民的斗志，歌頌革命的英雄气概；而他們却要用文艺来瓦解人民的团结，削弱人民的斗志，暴露革命的“黑暗”。他們反对艺术服从政治，主張政治服从艺术，实际上是要艺术服从資產階級的反动政治。这是那个由来已久的根本分歧在新的环境下的具体表現。这一次，他們的攻势很猛，但是，他們忘記了延安是工农当权的党中央所在地，大家的馬克思主义水平也比过去提高了，他們的进攻是必然要失敗的。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就給了我們战胜敌人的最銳利的武器。

和丁玲、王实味、蕭軍等人在延安的反党活动相呼应，胡风、馮雪峰他們在国民党統治区也进行了一連串的反党活动。胡风一方面在暗中組織他的反革命集团，一方面就公开地在文艺思想上攻击党的文艺路綫。馮雪峰則和他一唱一和。1940年前后发生的民族形式問題論爭，是被馮雪峰看作和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談会具有同等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而这場論爭，馮雪峰、胡风他們自認為是按照他們的論点作了总结。馮雪峰完全贊同胡风写的企圖总结这場論爭的“論民族形式問題”这本小冊子。在这里面，胡风把当时在重庆和延安的一切参加論爭的人全都抨击了，“真理”好象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胡风他們是在“保衛”“五四新文艺”的幌子下，根本否定民族傳統，否定民間文

艺。否定新文艺需要克服自己的脱离群众的缺点，而建立起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这仍然是文艺要不要同群众结合，要不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不要对群众的革命斗争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艺术要不要服务于政治的问题。而馮雪峰和胡风他们是采取否定的态度的。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胡风、馮雪峰他们心里是很反对的，却不好公开说出来。但是，后来还是憋不住，1946年馮雪峰就用“画室”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题外的话”这篇文章，攻击毛主席关于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反对“政治第一”的批评标准。胡风则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他说他也响应党的整风，但是，他却用加强“主观战斗精神”来代替思想改造，用“到处都有生活”来代替深入群众，同群众结合，……这正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所惯于采用的偷梁换柱的手法。

我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些历史事实，是要说明潜藏在革命文艺内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确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公开的资产阶级文学派别更是不堪一击，资产阶级分子就必然要鑽到我们内部来进行破坏，他们又同我们内部的一些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派别。他们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党的文艺路线，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次文艺界的反党浪潮，总是这一帮人在里面领头作怪。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确是身经百战，它是在同正面的敌人和暗藏的敌对分子不断地进行着极其复杂曲折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又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而胡风、馮雪峰、丁玲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还是用各种方式来抵抗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是文艺界的一个大毒瘤。解放后，文艺队伍大大地扩张了，进来了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反党分子们直接间接地得到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捧场，他们的反党气焰就更高涨了。到了去

年那样的条件下，就不能不来一个总爆发和总清算。

周揚同志的文章中有一段話講得很好：“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給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軍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給他們帶上的脚鐐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沒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縱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縱橫馳聘了。文学艺术也要建軍，也要練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軍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識分子大軍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義的人才會認為不正确。”这一段話包含了很深刻的意思。1956年我們完成了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經濟基础改变以后，上層建筑也不能不跟着改变，因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間的冲突，也就更加尖銳化起来了。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感到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調和，他們又从国际上的反共浪潮得到鼓舞，于是一场右派进攻和反击右派的尖銳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誰战胜誰的斗争，是“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在經濟基础沒有改变之前，要使許多人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徹底划清界綫，是不可能的。經濟基础沒有改变，新的社会主义的上層建筑也是不可能完全建成的。对于大多数人來說，也只有在这时候才会痛切地感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的危害性，因为这时已不單是思想問題，而是能不能“过关”，能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問題了。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問題。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給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使它們徹底崩潰（当然还不等于已經完全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只有經過这场斗争，文艺界和它的后备軍的生产力才能徹底解放出来。右派分子說我們用什么“千万条繩子”束縛了文艺的发展。这是誣蔑。我們工

作中的錯誤和缺点，比如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等，当然也是妨碍文艺事业的前进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束缚文艺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把这些枷锁打掉，社会主义文学是不会顺利发展的，文艺队伍的生产力也是不可能彻底解放的。这些东西阻碍了现有文艺队伍的前进，也妨碍后备力量的生长。新的力量不是一出来就被他们打掉（像陈企霞所做的），便是一出来就被他们腐蚀（像丁玲所做的）。我们有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伟大的党，有几亿的人在豪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文学上是必然会涌现出许多新的力量的，去年出现了几十部长篇中篇小说，许多作者就是刚露头的新人。但是，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打倒，这些新生力量就都有被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的危险。掉到资产阶级右派泥坑中去的青年作者难道还少吗？只有经过去年那场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才给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使“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周扬同志的文章，很科学而又扼要地说明了这场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分析了这一斗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我以为这是这篇文章的最大的贡献。

关于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周扬同志文章中也讲得很好。许多人说个人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我认为，个人主义思潮仅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在反封建上面有过作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快就转到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个人主义就失掉任何的进步作用了。个人主义在组织中、在行动中，总是和党和革命相对立，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不仅和党对立，而且还要求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改造党。所以，从党成立起，我们党内就一直和个人主义不断地进行了斗争。可是，如果在过去，个人主义还只是在党内是不合法的东西，在社会上却仍有或大有容身之地的话，那末，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集体主义

的社会，个人主义在社会上的容身之地也是一天一天地狭窄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关”，个人主义不但同党的組織性紀律性相对抗，而且同整个社会制度相对抗。这是以卵击石，个人主义者最后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周揚同志說：“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惡之源”。这句话，可以說是一句很好的格言。

張光年 周揚同志的文章，分析了左翼运动以来文学上两个阶级、兩条道路的斗争。大家要了解20多年来我国無产階級文学运动的基本經驗，从这篇文章可以得到很大帮助。但是这篇文章着重分析的，是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重大轉換关头我們文艺斗争中基本的經驗教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經過了一系列的斗争。党领导文艺界披荆斬棘，就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解放文艺的生产力，解除旧意識的脚鐐手铐，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大躍进扫清道路。去年以来的反右派斗争，又对旧基地做了一场集中的、猛烈的扫蕩。现在可以看出，清扫旧基地的工程是多么重要！沒有一場政治上、思想上的大革命，就沒有今天的大躍进。有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躍进，才有創作上、业务上的大躍进。反右派斗争的一个直接的成果，就是今天这样蓬蓬勃勃大躍进的新气象。正像周揚同志的文章所說，基本的道路开辟出来了，几十路、几百路的無产階級文艺战士可以在这条道路上縱橫馳騁了。但是略一回顧，清扫旧基地的工程又是何等艰苦啊！文艺界經過一系列的戰鬥，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真是千辛万苦，才摸到了一些經驗。现在，这些經驗教訓中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被集中起来，經過提炼，写在周揚同志这篇文章里了。所以說，它得之不易，大家讀起来就特別感到亲切，感到宝贵。我們应当很好地利用这篇文章，使文艺界同志們大家从中吸取一些东西。周揚同志的文章，內容很丰富，好些重要的經驗教訓，都以压缩的形式表現出来。我建议文艺界組織一些小型討論或座談，或根据切身的体会，抓住几个問題写出文章来，从各个方面做一些發揮和闡解，帮助大家把整风运动中已經得到的进步巩固下来。